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日本學

第三輯

北京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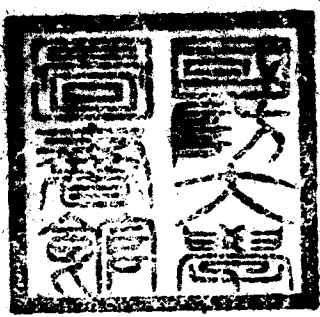


60666/07

日本学

第三辑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 本 学

第三辑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55 千字

1991 年 3 月第一版 199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301-00135-5/C·28

定价:5.70 元

前 言

《日本学》是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辑的学术论文集。它的宗旨是，对日本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与他国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深层文化方面的特点。故命名为《日本学》。

研究日本学必须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全面观察日本，而不失之偏颇，才有助于人们深刻地了解日本，客观地评价日本。《日本学》采取这种态度。

一国的特点只有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比较必须是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的方法既可以采用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传统方法，也应该吸取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的新鲜方法和现代化手段。《日本学》提倡并突出比较研究、学际研究，重视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

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按照某种主观意图去剪裁甚至曲解事实，这种削足适履式的为现实服务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提供正确的事实和对事实的正确解释，是学术发挥其社会效益的唯一正确途径。《日本学》坚持这一原则。

日本学的定义、内涵，乃至其能否构成一个学科，人们意见未必一致。尽管如此，日本学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研究的对象，并且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应该积极吸取国内外各学派的日本研究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应照搬，不应人云亦云，做传声筒。历史证明，照搬、当传声筒只会扼杀创造性。《日本学》的目标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日本学。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全国日本研究者的坚毅的努力。
《日本学》虽然主要反映北京大学日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但它并不是狭隘的同仁出版物。《日本学》实行开放的方针,热忱欢迎国内外日本研究者在这块学术园地上发表论著,交流见解,展开争鸣。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学历社会剖析	樊建明(1)
集团意识历史发展初探	夏 冰(15)
日本的国际化与东南亚	王振锁(28)
思想与日本文化论	
.....〔日〕大桥良介著 刘金才 杨晓捷译	(46)

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	王晓秋(65)
二十世纪日本人的中国观(上)	严绍澍(81)
福泽谕吉中国观变迁述评	宋成有(98)

夏威夷移民问题与日美初期军事对峙	司美丽(114)
中途岛海战后美国对日战略质疑	马红娟(125)
日美关系的现状及九十年代的展望	李寒梅(139)

日本律师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康树华(154)
日本的律师道德	
——律师法和《律师道德规范》述评	仇 青(170)

四、五世纪日朝关系的若干问题	沈仁安(178)
试论福泽谕吉的启蒙教育思想	关松林(194)
日本早期中国学学术流派辨析	刘 萍(207)

中日书学研讨会

杨守敬来日及与日本书法家的交流	〔日〕杉村邦彦(222)
张裕钊对宫岛大八的指导及其方法	〔日〕鱼住和晃(230)
北方心泉:为人及其书法的意义	〔日〕野上史郎(238)

中日书法艺术同源异流考辨..... 陈玉龙(245)

中日筷子习俗与禁忌辨异..... 贾蕙莹(252)

教育之道,文化之桥

——我的几点看法..... [日]池田大作(263)

克制自我的生活态度..... [日]冈本常男(269)

梅原猛学术思想初探..... 魏常海(282)

一部有特色的教科书

——评赵建民、刘予华主编《日本通史》

..... 王晓雯 刘 巍(291)

研究夏目漱石的新角度

——评李国栋著《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 顾 越(295)

在苗族文化与日本文化间寻求共同点

——原秀三郎著《图说日本人的原乡》评介..... 舒 父(299)

《东亚中的日本历史》书评综述..... 安 文(302)

苏联的日本研究机构简介..... 陈文寿(305)

走在日中友好的金桥上

——创价大学与北京大学两校学生暑期联谊活动

..... [日]小山满(311)

良宽诗碑落成于峨眉山脚下..... 兰 草(313)

衣水桑梓书增谊

——北京大学出版社注重出版有关日本方面的著译

..... 丁 和(315)

编 后..... (318)

学历社会剖析

樊建明

所谓学历社会,是指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上,学历起着重要作用的社会。

在日本,人的社会地位基本上是由所从事的职业决定的。而在决定职业的各项因素中,较之出身的社会阶层、财产的多寡、能力的强弱等,学历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日本人普遍认为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是学历社会。长期以来,日本人已习惯了这一社会成员的職業分配方式,并积极地适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偏重学历的思潮的兴起,高学历者阶层的增大,现在人们更多的是从怀疑和批判的角度议论学历社会的弊端,主张变学历社会为能力主义社会的呼声也越发强烈。为较全面地对日本的学历社会做出评价,本文想就日本学历社会的形成、特点及发展趋势做一介绍和剖析。

任何形态的社会,均存在着以何种形式分配社会成员的社会职业的问题。一般而论,在产业革命以前的封建社会采取的基本上是世袭制度,父辈所从事的职业沿袭到子辈,其中原属的社会阶层、财产的多寡起着决定的作用,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和变化甚小。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产业革命的发展,世袭制度受到冲击。人们凭借平等、自由等资产阶级的思想,要求根据能力、意愿选择职业。同时由于技术的发展,新的生产领域的出现,不同的职业要

求具有各种实际能力的人担任。因此，建立在世袭制度上的以家庭为中心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形式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父辈所从事的职业对子辈将从事的职业的影响程度相对下降，社会开始重视人的实际能力。因为学校是培养人的能力的主要场所，所以衡量某人能力的尺度自然转向了该人在某一级学校所学习的内容、时间等。在此社会需求下，以受教育机会均等为主要原则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逐渐完备，学制与教育内容趋向统一，学历成了人的能力的主要标志。社会开始用学历评价人，不同的学历成了决定社会成员不同职业的主要依据。诚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能否取得某种学历，除本人的素质外，仍同其父辈所处的社会地位、所从事的职业有直接关系。但从表面形式看，决定人的社会职业已从封建社会的世袭制度转向以重视学历为主了。

在日本，重视学历，将学历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始自明治维新时期。至本世纪初，因学历不同而职业各异、报酬不等的学历社会的结构已完全确立。如当时大企业的雇员一般分为四个等级：职员、准职员、技术工人、辅助工。只有大学和大专的毕业生能担任公司的正式职员，负责经营、管理，享受月薪待遇；中等学校和中专的毕业生为准职员，从事特定范围的事务性工作，薪水日计，缺勤扣工资；高等小学的毕业生被录用为一般技术工人，实行日薪制；普通小学的毕业生只能充当辅助工，从事搬运、包装等单纯性劳动，劳动条件恶劣。各等级之间的工资额的差距更大。日本为什么能在短时期内摆脱封建世袭制的束缚，而成为一个重视学历的国家呢？其主要因素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与完整的教育体制。明治维新以后，为摆脱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危险，提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建国方针，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当时的领导人在分析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后，得出了教育是立国之本的结论，大力发展了日本的教育事业。同时，日本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建立伊始，就十分注

意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初等以上的各级学校在入学资格上,都明确规定要具有下一级学校的毕业水准,使各级教育形成了一个相互衔接的整体。根据不同学历可对人才的能力进行明确的比较、判断和选择。

二、尊重教育的社会基础与提高社会地位的欲望。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日本人的价值观念中历来对教育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变成更善的存在。这种思想导致人们接受教育的欲望。但是在封建社会,教育分为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教育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平民教育两个系统进行。前者的教育水平大大高于后者,教育是维持社会等级的一种手段。因此,人们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其社会存在的欲望受到了社会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束缚。明治维新以后,政府废除了身分制,并积极宣传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天不造人上人,亦不造人下人”,“学问乃成名发迹之资本”。世袭制度的废除,量才用人制度的确立,得到了国民的广泛拥护。在尊重教育的社会基础上,一股强烈的提高社会地位的意识,激励着人们进入学校以获得较高的学历,寻求好的职业。

在上述背景下,学历社会支配了日本,一直持续至今。虽然它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但至少在其确立之初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表现为:(1)它冲破了家庭、财产、性别等的束缚,使真正有学识的人担负起与其能力相适应的职务,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2)社会阶层间的移动,在原来横向移动中加入了纵向移动。尽管这种移动受到了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但它确实为一小部分社会阶层较低的人通过获得学历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提供了可能。(3)不同学历者间明显存在的职业与收入的差距,构成了人们尊重学历、追求学历的动力,客观上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国民的素质得到了提高。

二

如前所述,日本的学历社会表现为,不同学历者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受到不同的待遇。因此,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日本存在着相互封闭的几个劳动力市场。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要求截然不同。如以大学毕业生为对象的劳动力市场,重视的是高度的知识、创造能力、领导水平、独立工作能力和协调能力等。而以高中毕业生为对象的劳动力市场,则要求基本的技能、顺从性和忍耐力等。劳动力在各个劳动力市场间基本上是不可移动的。因此,学历严格限制了人们可从事的职业。这一现象或许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不足为奇。然而,当它同日本的雇用制度溶合在一起后,便带上了日本学历社会的独具的特色。即青年人毕业时的学历不仅决定着就业之初的职业,而且大幅度地左右着他一生的发展。

日本企业采用终身雇用制和一年涨一次工资的“年功序列制”。企业职工如脱离本企业重新就业,将在工资方面处于不利的境遇。而且其他企业也会因其“爱社心不强”(忠于企业的思想不坚定)而不愿雇用;难以找到好的工作。因此,青年人一旦步入社会,基本上就将在某个企业或部门工作一生。另外,不同学历者一生中的晋升也被分别置于不同的固定模式中。一般而言,大学毕业就业后,大约在35岁左右升为系长,40岁左右升为科长,50岁左右很多人被提拔为处长。而高中毕业生就业后当工人,30岁至40岁间开始从事事务或技术工作,40岁时很多人可升为系长、科长,但担任科长以上职务的人为数极少。作为最低学历的初中毕业生,只能一生当工人。根据日本学者1975年对部分企业的调查,企业的科长、处长、经理等管理人员的90%以上,是由拥有高等教育学历者担任的。^①

职务的不同导致收入水平的差距。以1963年为例,以初中毕业生的初任工资为100,高中毕业生为133,大学毕业生为196^②。

同时也不会因低学历者较之高学历者就业时间早、工作时间长而弥补和缩小一生总收入的差距。相反,随着就业年限的增加,工资差距就越大。据 1974 年的统计,扣除高学历者多支付的教育费用后,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一生总收入只分别为大学毕业生的 70% 和 78%^③。上述事实说明,学校毕业生步入社会时的学历,不容改变地决定了一生所从事的职业、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收入水平。

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学历社会的上述特点是由高学历者的比率较低造成的,当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后,学历社会将自然消亡。然而,从日本的现实看并非如此。

战后,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 5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初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带动了高等教育规模的膨胀。70 年代中期高等教育机构已近 1,000 所,中学生升学率最高达 39.2%,高等教育在校人数最多为 226 万^④。日本人称此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并把日本的社会称为“高学历社会”。在此背景下,每年就业的毕业生中大学毕业生的比率提高。而大学毕业生就业领域的需求并未同步增加,特别是在经济转入稳定增长后,此现象更为明显。部分大学毕业生开始进入原高中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

高学历者的大量涌现的确冲击了日本的学历社会。然而,日本的学历社会并未因此而动摇,它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在日本社会。高学历者的增加使用人部门选择人才的余地增大,其注意力逐渐由注重低学历者与高学历者间的差别转向注重同等学历者间的差别,即在高学历者中间进行选择。这样,使少数所谓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较之其他大学的毕业生,在就业和晋升上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为此,通向社会上层的途径已由原来的大学演变为名牌大学。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学历社会为“纵向学历社会”的话,那么,现在又在其基础上加入了“横向学历社会”。日本人称“横向学历社

会”为“学校历社会”。“横向学历社会”并未改变学历社会的性质，只不过是学历社会的档次上加了一个纵向的档次而已。

日本的学历社会刺激着人们追求高等教育的学历、名牌大学的学历，无疑带来了激烈的教育竞争。竞争的焦点集中在大学的升学考试上。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70年曾派调查团调查了日本的教育政策，在报告书中写了下述一段话：一个人在18岁的某一天所取得的成绩，即可决定他的一生。换言之，在日本，大学考试发挥着可大幅度左右一个人未来经历的选拔机能。这段话分析得很深刻。“18岁的某一天”是指大学招生考试的那一天，考试的成绩如何直接影响到将来的就业和一生的发展。为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试同高等教育发达的美国做一比较。

首先，美国的大学一般对新生入学掌握得比较松，而对毕业生的要求却比较严。大学内部有淘汰，学生之间有竞争。因此大学具有对人才进行筛选的职能。日本大学的这种职能很弱。日本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在选择学生时要求十分高，入学考试严格。但一旦将学生招入学校便放松要求，一切凭学生自觉，而且入学者几乎均可毕业。这意味着考入太学者已获得了大学的学历。

其次，美国是一个贯彻能力主义原则的国家，用人部门在选择人才时虽然也要求学历，但更重视实际工作能力。而日本的用人部门过多地看重大学的牌子，对大学毕业生的实力则放在次要位置。一个时期内，有的企业甚至采取只招收某一名牌大学毕业生的“指定校制”。结果，只要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即可保证好的就业。

再次，在美国，企业内部人才竞争十分激烈，淘汰率也很高。学校为竞争中的失利者提供了重返学校学习的机会。低学历者可获得高学历，高学历者可进一步提高才智，为重新就业创造条件。日本则不同。日本在教育制度上虽然也允许成年人入学，但是如上所述，日本实行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而且用人部门一般只招收年轻人，所以在职人员如退职就学，再就业将发生困难，并在工

资方面蒙受损失。为此,在全日制学生中几乎没有重返学校者。可见,在将学历作为就业条件的做法上美国与日本是相同的,但在获取学历的机会上日本人一生只有一次,而美国人却不只一次。

由于日本社会各种条件的限制,矛盾的焦点全部集中在高中毕业生的升学考试上。有人比喻说,日本人有“两种出生”,即“生物性出生”和“社会性出生”,决定人一生发展的是社会性出生,而这种“出生”对日本人来讲,和生物性出生一样,一生中只有一次。

三

学历社会之所以长期存在于日本,与日本的用人单位有着密切关系。企业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为生存原则的。在这一原则支配下,日本的企业在用人制度和经营管理中利用了学历社会。在高学历社会,企业在雇用新成员时有两种倾向。

首先,在纵向学历的比较中,企业愿意雇用高学历者。从各领域的不同学历的就业比率看,在专门科学技术知识领域内,大学毕业生具有高中毕业生不可替代的素质,自然大学毕业生所占比率一直居首位。然而在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均可就业的领域,或原为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均可就业的领域,也出现了大学毕业生就业比率逐渐提高的趋势。以事务性工作为例,1955年该领域中男性就业的学历构成为:初中毕业生占6%,高中毕业生占65%,大学毕业生仅为29%。事务性工作原主要由高中毕业生承担。到1975年,大学毕业生在该领域的比率上升为58%,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的比率下降为1%和41%。在贩卖、服务行业,大学毕业生的比率也从1955年的2.5%,上升为1976年的20.4%。^⑥在此,虽然反映出在高学历社会下原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部门不能全部容纳所有的大学毕业生,致使一部分人屈就于其他领域的趋势,同时也反映出企业愿意雇用高学历者的倾向。其原因有二。

其一,企业对大学生予以肯定的评价。除肯定大学生在校学习

了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实力外,更重要的是肯定其四年的大学生生活本身。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为使本部门具有活力,在社会中站住脚,在人才的选择上很重视人的特性。因此对一般事务人员要求的主要标准,既不是基础学力也不是专业知识,而是社交能力、协调能力以及丰富的个性。具体地讲,企业主要注重毕业生的顺从性、忍耐力、干劲、责任感、讲话能力、社交能力等一些无从计量的软标准。他们认为在此方面大学毕业生大大强于高中毕业生,而这些能力和个性来自四年的大学生活。四年中大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通过大学内的各种组织,增加了对社会的了解,开阔了视野,具有宏观看问题的能力。有的企业优先录用担任过学生社团负责人的毕业生,认为他们能笼络人心,有工作和组织能力。

其二,廉价的大学生为企业提供了雇用的条件。在高学历社会下,大学毕业生大量增加,使大学毕业生的劳动力价值相对下降,为企业雇用高学历者创造了条件。1960年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占全体就业人口的比率为6.6%,具有稀有价值,因此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初任工资为高中毕业生的1.4倍。到1974年高等教育毕业生占就业人口的比率已上升至14.5%,提高1倍多,随之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初任工资只相当于高中毕业生的1.2倍^⑧。说明企业在雇用新的劳动力时,只需多花20%的费用,便可雇用到具有多方面特点和能力的大学毕业生。从学生方面看,如前所述,一些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不得不屈就原主要为高中毕业生就业的领域。

企业在雇用新成员时的另一倾向是,在横向学历的比较中愿意雇用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其原因可归纳为三点。

其一,企业相信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实力。日本的所谓名牌大学包括前身为战前旧帝国大学的学校和为数极少的几所私立大学。这些学校由于历史悠久,教育经费雄厚,师资力量强,教育水准高于其他学校。加之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能进入上述学校的学生本身素质好,因此客观地讲,名牌大学的学生水平较高,有一定实力。

另外,又由于用人部门在工作中重用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委以重任,使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发挥了作用,所以社会上对名牌大学毕业生予以很高的评价,并形成了固定的看法。为此企业对雇用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感到放心。而且,企业还认为他们的工作责任感强,有吃苦精神和坚韧的干劲。根据是,他们之所以能在“18岁的某一天”超越数以百计的竞争对手考入名牌大学,其本身就说明他们在接受入大学前的12年教育中,有一种毅力。这种素质运用到企业经营上,必然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其二,录用名牌大学毕业生可节省费用。企业在经营上要考虑每一环节的费用支出。如果放弃学校教育的基础,不考虑学校间教育水平的差距,企业单独制定用人标准,对所有应招者逐一进行筛选,那么每年一次的录用新人的工作将构成企业的一大负担,需动用较多的人力、物力。为降低此项费用的支出并减少失误,大企业利用了“横向的学历”。换言之,企业完全依靠了教育体制本身的选拔职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被优先录用到大企业的现实,进一步提高了名牌大学的威望,作为一种社会的反馈,又加剧了名牌大学的入学竞争。竞争越激烈,大企业就越可放心地录用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越可保证新雇用者的质量。

其三,有人说,一个日本人与一个外国人竞争,日本人会失败,而三个日本人同三个外国人竞争,日本人则会取胜。这里反映出日本民族注重集团力量的特点。把这一特点运用到企业经营上,就表现为最大限度地保持企业内部的稳定,使之形成拳头,同其他企业竞争。为此,日本企业内部提倡温和主义,限制竞争。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以及各种带有封建色彩的管理方式,就是这一经营思想的体现。作为稳定企业内部秩序的一种手段,企业也利用了学历。这首先表现为将不同学历者分别置于固定的职业和晋升的模式之中。实现高学历社会后,企业内部劳动力学历构成普遍提高,大学毕业生的比率增加。如不加以限制,在大学毕业生之间必

将出现以晋升为中心的竞争。为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与雇用新职员时优先录用名牌大学生的做法一样,有些企业在晋升中也优先提拔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不论从企业管理干部总学历构成看,还是从不同年龄的干部职务的统计看,少数名牌大学毕业生明显地占据优势。这一做法在部分企业中已成惯例,对被雇用者讲只是个顺从问题。总之,企业在高学历社会的形势下又巧妙地利用了“横向的学历”,限制了本企业内部的竞争,稳定了企业内部的秩序,保证了企业对外部的竞争能力。

从以上的分析中即可看出,日本学历社会的基础深深扎根于日本的企业之中。

另外,还应看到日本政府部门在利用学历社会和加剧学历社会方面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政府主要机构的官僚几乎都是以东京大学为首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战后大多数的总理大臣也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政府部门录用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原因很多,如认为他们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责任感强等,但也不可忽视几所名牌大学毕业生长期以来在政府机构中形成的派阀的作用。

四

日本的学历社会虽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和问题。

首先,从宏观上分析,日本的学历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才的开发,是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如前所述,日本人是否能得到重用,是否能将自己一生的全部才智贡献给社会,关键取决于在“18岁的某一天”升学考试中能否获得好的成绩。这里明显地反映出对人才过早地做出评价并将其固定化的问题。即使说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并能排除一定的偶然性,通过一次考试可全面考察一个人的实际水平的话,那么,大学的入学考试也只能证明一个人是否掌握了从小学至高中学校教育中所教授的文